

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

魏定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 - 1920)

著作责任者：[美]魏定熙著 金安平、张毅译

责任编辑：沈 劭

标准书号：ISBN 7-301-03686-8/ G · 445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达卡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者：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05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定 价：15.00 元

序 言

萧 超 然

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

20 年前,我开始业余研究北大校史。1978 年,为了纪念建校 80 周年,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北大校史的文章,题目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 年第 1 期),那是一篇关于北大政治史、革命史的介述,对于北大的文化、学术品格,完全没有涉及。1979 年是五四运动爆发 60 周年,也是李大钊诞辰 90 周年,国内学术界盛大纪念、庆祝,有关方面约我写点文章,这推动我继续对北大校史的研究,并使我产生了把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想法,尝试拓宽研究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应该说,从这时起,我才确立了准备长期业余研究北大校史的方向。

在这一研究进程中,我用去了八小时以外的大部分时间,手抄笔录,淬砺攻错,称得上是穷年兀兀,九死无悔了。这其中有艰苦,也有欢乐,而最令人难忘者,则莫过于我的这种研究意外地受到了一位外国朋友的关注。

1992 年 9 月,我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主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的信,魏教授在信中推荐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生魏定熙(Tim Weston)来北

大进修一年,作关于北大早期历史的博士论文研究,希望我做他的指导教师,帮助他确立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并能让他有机会阅读一些北大早期历史的档案材料。魏斐德教授是美国知名学者,我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未曾谋面,也从未联系过。1990年至1991年间,我曾两次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其中一次就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腊(Santa Barbara)分校,住了三个月,与魏教授所在学校同在加州,可说近在咫尺。但由于秉性疏懒,也没有去走访拜望。这次魏教授主动来信,把他的得意门生推荐到北大,并要我做他的导师,研究北大早期历史,说了这么多热情而客气的话,这自然给了我很大的欢快与欣慰。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研究受到朋友的关注,特别是一位外国朋友的关注感到更高兴呢?对我来说,这要算是最令我高兴的一件事了。

随后不久,魏定熙博士就来到北大,很快与我建立了联系。他很年轻,给我的印象温厚而机敏。对研究北大历史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如何使研究富有成效的问题,我帮助他订了个一年研究计划,并向他提供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

为了使其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我邀请金安平女士作助手,协助进行指导,并解决他在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行政事务问题,诸如到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到档案馆查阅、复印档案,到外单位进行交流等等。金女士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出色,保障了魏博士在北大这一方文明沃土中学术活动的有序进行,使他读了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不少珍贵文书档案和图书资料。

这一年,我和魏博士合作得很好。我们双方商定,每月约谈一至二次,每次两小时左右。一般由他提出问题,我作解答。我记得开头几个月,他提出的问题很多,大至北大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至文科学长逛八大胡同,五花八门,毫无框框。魏博士很勤奋,对学习抓得紧,每次约见,他从不

缺席,也从不迟到。后来我们约谈的方式,从单方面答问发展为讨论,双方交换学术观点,有时还穿插讨论当前一些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即便我们的观点彼此各不相同,也能做到很平和地交换意见,彼此都不感到有压力,毫无紧张气氛,充分体现了北大一贯倡导的学术民主、兼容并包的精神。

魏博士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因此我们之间的交流毫无障碍。间或也有他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组来表达其深邃的学术观点的时候,这时他就会用英语说出来,或者用英语写在纸上给我看。我粗通英语,对一般 simple sentence 还能看懂,经过这样笔助,双方也就沟通了,达到了心领而神会。

魏博士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人的尊重。他在用中文写给我的一些信函和便条上,开头总是写上“ Dear 萧老师”,末尾总是签署“ 您的美国学生 魏定熙”,大有“程门立雪”的味道。这使我很感动,也觉得亲切。我把这既看做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看做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深愿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把这种友情传下去。

1993 年 6 月,魏博士在北大的研究结束回国了。1996 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给我寄来了戴博士帽的照片。这年 6 月他再次来到北京作短暂访问,我们愉快地见了面。他答应要给纪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诞辰 130 周年和北大校庆 100 周年写文章,我期待着不久会与他在燕园再次见面。

魏博士在北大一年的研究富有成效。他写了一篇题为《重塑一个形象——1917 年至 1920 年间北京大学的教育、文化与政治》的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4 年第 3 期上。如作者所说,“这篇文章要探讨北大为什么和怎样在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构成了作者博士论文的重要内容。1997 年 1 月,魏博士来信告诉我,他已到科罗拉多

(Colorado)大学历史系任教,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对北大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理,这就是摆在我案头的这本书稿——《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这本书抓住北大的一个显著特征——光荣的革命传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北大早期的历史加以审视。它将北大的建立和发展放在中国政治文化尤其是20世纪初期北京政治文化的背景中加以探究,探索学术与政治的边界,教育与政府的关系,论述北大何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并超越教育而在中国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作者旁搜远绍,藻思纷披,完全可以这样说,它不是一般平平之作,而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历史、政治科学论著。这本书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它引用了大量中外文第一手历史档案和图书资料,使它的学术内涵更为凸显,这是值得学习的。

金安平女士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商请北大出版社于北大建校100周年之时付梓出版,北大出版社乐予支持。负责其事的李昭时先生垂青不佞,要我在书的前面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美国朋友把他在北大学习期间所研究写成的一本关于北大早期历史的著作,要在北大纪念建校100周年这个难逢的时节,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不是首先拿到美国国内去出版,这事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所折射出来的中美友谊,所蕴含的深层底蕴,是令人依恋,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篇并非全是多余的话。

1998年1月

致 中 国 读 者

北大出版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我感到十分荣幸。因为我非常热爱北大并且在那里有许多朋友。

现在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仅仅是一部不很成熟的著述，我诚恳地希望中国读者不吝赐教，使我知道如何去完善和提高它。在对这部论著进行修改和补充之后，它将在美国出版。

魏 定 熙

1998 年 1 月于美国科罗拉多

鸣 谢

我谨在此对帮助我完成论文的所有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中国方面,我首先要感谢萧超然教授。1992 到 1993 年我在北大做研究期间,他慷慨地让我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并亲自给我解答了许多问题,我从他的研究著作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金安平副教授,没有她的耐心、友谊和建设性的意见,我的论文也不可能完成。我更感谢金安平副教授和张毅先生等人将它翻译成中文。此外,我也要感谢北大的张寄谦教授和郭建荣教授,他们提供的资料和丰富的知识对我帮助极大。

在美国方面,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1986 年时,魏斐德教授建议我到北大学习以提高我的汉语水平,正是这次北京之行使我产生了对北大的兴趣。以后,魏斐德教授又鼓励我以北大早期历史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的第二位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Yeh Wen-hsin)教授也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支持,她的许多思想对我的论文影响重大。我还对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的同学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李昭时先生、沈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表示敬意。

魏 定 熙

1998 年 1 月于美国科罗拉多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最高学府”与清末北京的政治文化	7
一、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1895—1898	9
二、“戊戌大学”, 1898—1900	13
三、重新开始: 张百熙和“壬寅大学”, 1901—1903	17
四、未来的英雄和政府的镇压, 1903	22
五、官场文化的持续影响	29
六、步履艰难的改革, 1904—1909	33
七、晚清的进步和封建帝制时代的结束	39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 1912—1916	55
一、辛亥革命后改革的最初尝试	57
二、十字路口: 谁来接管北大	63
三、1913年5月的预科抗议	70
四、胡仁源任期内的持续和变化, 1914—1916	74
五、章太炎的门生及新的调和	80
第三章 新文化团体的形成	104
一、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	105
二、章士钊、《甲寅》及新文化团体的核心	108

三、从《甲寅》到《新青年》	115
四、团体之外	117
五、机遇之窗	123
六、浙江关系与蔡元培的通往“高校”之路	124
 第四章 旧文化与新文化.....	139
一、北京大学新的掌门人：蔡元培和他的权力境况	140
二、新文化社团的形成	146
三、重建最高学府	155
四、理想与现实	165
 第五章 超越教育：充当政治舞台的北大	191
一、教育和政治间的模糊边界	192
二、政治的显著吸引力	202
三、新闻业及其影响舆论的运动	209
四、文化的政治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北大	217
五、五四运动和作为政治势力的北大的诞生	224
 第六章 结语：大学与文化市场之间	247
 译者后记.....	263

引 言

20 世纪初年帝国体系的崩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1905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使知识阶层丧失了他们得以分享中央政府权力和声望、确保他们在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的重要的制度性支持^[1]。本书的重点放在北京大学早期的历史,以期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在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北大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一直是重要的大学。1898 年建立伊始,它被设计成全国性的学校教育的最高机关以代替建立在科举考试制度之上的陈腐的帝国教育体制。

鉴于没有对北大前 20 年历史深入研究的英语著作,我在本书中比较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学校的一些细节。但是本书并不想写成教育制度史,也不打算提供一个有关北大前 20 年的综合性的评论。相反,我的兴趣在于北京大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交叉点上所占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具体说,我所关注的是北大早期历史所昭示

的中国知识精英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认同,并试图在深刻的大变革时期保持他们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事务中的统治地位和特殊的声音。

北京大学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来自于它建立时的精英地位和它与中央政府的紧密关系;它又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是因为它的教职员站在由国家支持的争取实现中学与西学新的平衡的最前列。这种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结合几乎使北京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也产生了政治的影响,在那里,有关文化问题的争论也会折射出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早期的北大就是这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首都知识精英如何在政治文化的急剧变化中寻求重新定位的背景,——这里的政治文化即指政治生活的规则、政治行为的公共价值和共同期望^[2],——在他们关于社会的基本观念逐渐瓦解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处在一种深刻的危机中。

通过对 1898 - 1920 年北大的研究,我认为北大并不是从始至终一直处在努力振兴中国政治文化的前沿。的确,在蔡元培 1917 年执掌北大之前,在某种意义上说北大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一潭死水,它与首都官方文化的密切关联远远超过了它作为国家有活力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存在。本书前两章对 1917 年前北大状况的研究,将说明清末和袁世凯时代的北京大学在政治与文化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有意或无意)远不如他们所受到的文化特殊地位的困扰更为显著。事实上,当时有关政治与文化的最激进的思想 and 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最大胆的尝试都不是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首都^[3]。

假如这所国立大学与北京的文化保守主义相一致,那么就要对为什么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知识精英团体——在本书中我把它称为新文化团体——在 1917 年初寻求这样一个正式

的机构作为它们的基地作出解释。尽管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以南方几个省为基础,尽管上海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新文化团体仍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行动来改变整个国家。这部分是由于一些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能在首都谋取重要职位的渴望,部分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在新文化知识阶层正努力显示他们在国家舞台上角色的特定历史时刻,具有政治意义的首都仍延续着一种对特权地位馈赠的权威。当然,这种赠予也成了被抨击的靶子。不过,通过与中央政府保持关系,新文化的领导者可以抬高他们个人的地位,获得重要的新的讲台,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能够被广泛接受。北京大学就像一个麦克风,每个通过北京大学来发言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

北大被认为是一个能够传播新文化思想的潜在的讲台,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即它是可以被彻底重新改造的,尽管 1917 年前这个学校的文化事务是和首都的政治机构纠缠在一起的。除了蔡元培没有人能改造北大。本书核心的两章将专门讨论 1917 年后这位举足轻重的校长。当然,蔡元培并不是单枪匹马地改造北大,但他确实是具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关键人物。

他在北大灌输一种德国风格的学术精神的努力提供了北大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他的学术地位、纯洁的名誉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保险。尽管蔡元培在担任校长后曾一度有过激进的政治策略,但他还是渐渐趋向于政治上的温和,在行为举止上他仍是一个完美的典型的中国文人,——完全不同于首都的那些政治掮客。蔡元培之所以接受北大校长一职,是因为他心仪教育,并且以身相许,他特别坚持北大应是求知的场所而不是政治野心家的温床。换句话说,这就是蔡元培刚到北大时所讲的,要将教育与政治分离,而不是使学校成为政治化的机构。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蔡元培将北大从世俗世界的污染中分离出来,使它的学生和教授都全身心地追求培养高尚道德的愿望与他所看到的北大在社会中实际角色的现实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最终,蔡校长关于教育应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积极变化的信念,又促使他去寻求一种使这所国立大学政治化的策略。然而,这显然不是蔡元培的初衷。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积极扩展活动领域抱支持态度,是他对教育目的的多重性、广泛性理解的逻辑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文化模式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与忽略讨论新文化运动和作为保守的道德仲裁人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早期研究不同,我将探讨新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促成新文化领袖形成的精英主义^[4]。新文化团体大多由对革命家和政客都失去信心的政治温和主义者组成,它的成员渴望形成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团体,他们都深深地关怀个人道德,完全与知识精英认同,并且都拥有良好的儒学传统,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新文化团体的领袖们认为,他们对在教育的名义下通过培养公共舆论来尽社会的职责拥有权利和责任,正像他们已着手做的那样。

然而,在寻求获得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新文化团体的领袖们遇到了民众无知和冷漠的阻碍。为了打破这一阻碍,他们必须在宣传、教育中使用最为简单易懂的语言,以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的日益激进,向首都的那些依赖现状的政治团体提出了挑战,北大的新文化领袖们也开始越来越疏远和淡漠由国家给予的最高地位。

如果不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使新文化领袖普遍地产生了破除偶像的兴趣或支持这样的活动,——中央政府中的保守势力早就会把北大中的激进教职员清除出去。在本书的结尾

处,我探讨了作为政治示威活动的五四运动及作为这个运动结果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为北大的知识领袖们提供了一个传播他们思想的广阔市场,他们怎样日益摆脱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从这点上看,北大仍旧是传播新思想的中心。这一过程对于现代和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1]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特权地位的代价,是他们不得不接受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对他们独立性的限制。有关这一点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代达罗斯》(Daedalus)1972年春季号。

[2] 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见林恩·亨特(Lynn Hunt):《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第10页。

[3] 有关这个问题,赞容(Peter Zarrow)、德里克(Arif Dirlik)和兰金(Mary Rankin)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见赞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兰金:《精英行动主义和中国的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

[4] 在对五四运动的经典性研究中,周策纵(Chow Tse-tsung)没有提出新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起源问题,而是把它当作国家主义情绪的自然增长和西方式自由主义的输入。约瑟夫·陈(Joseph T. Chen)也持同样观点,尽管他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区分,但仍认为这个时期的激进主义是由国家主义情绪而生的。薇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充分讨论了新文化思想的内容,但她没有注意新文化领袖的启蒙动机。在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关系的最新研究中,他强调了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思想,但没有思考他们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建立在什么

样的世界观基础上。赞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和非儒家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赞容不太注意研究那些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约瑟夫·陈：《上海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莱顿：E. J. Brill, 1971）；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德里克和赞容前书。

第一章

“最高学府”与清末北京的政治文化

许多研究 1911 年辛亥革命起因的学者都把着重点放在京城以外地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各省的省城和上海,以及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会,都不像北京那样封闭,所以这些地方更有可能孕育改革与革命的力量,最终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1]。与各省适应力强,勇于变革的官员相比,北京的高官们似乎显得过于目光短浅,而且大都腐败得无可救药。但是,认为清政府因为不理政事和无能而崩溃的观点,最近受到了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Leynolds)的批驳。他在一部雄心勃勃、富有挑战性的著作中称,1901 年清廷发起的新政,即“新的体制改革”,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庞大的“无声”革命^[2]。尽管变革无法延缓 1911 年导致清朝灭亡的革命,但是雷诺兹坚持认为变革者们成功地改造了中国,而且使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国(直至可预见的未来)深深地扎根于新政所建立的文化与制度基础